

● 元典文化丛书 ●

星学宝典

《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

郑慧生 著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星学宝典



《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

郑慧生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796504

元典文化丛书

星学宝典

XINGXUE BAODIAN

——《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

郑慧生 著

责任编辑 龚留柱

责任校对 孙 方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9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 精装 22.00 元
平装 17.00 元

ISBN 7-81041-509-3/K · 220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

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义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惟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惟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文化传统,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义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做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

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于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其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

自己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期,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司马迁——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	
1. 司马氏的天文世家	(1)
2.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	(3)
3. 关于司马迁的“字”	(5)
4. 关于司马迁的出生地	(6)
5. 司马迁的前半生	(7)
6. “李陵之祸”	(10)
7. 司马迁的受刑	(13)
8. 司马迁的重新任职	(14)
9. 司马迁的晚年	(15)
10. 任安的被杀与司马迁的终局	(16)
二 从“日出而作”到“观象授时”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诞生	(20)

1. 远古人民对天文的观察 (20)
2. 帝尧时代天文历法学的滥觞 (22)
3. 《夏小正》——中国最早的历书 (25)
4. 商历——初创时期的历法 (28)
5. 周历与阴历月貌 (33)

三 由“君不告朔”到“行夏之时”

——中国历法从混乱走向统一

- (37)
1. 历法混乱的春秋时代 (37)
 2. 战国, 历法服务于政治的统一 (47)
 3. 秦汉, 中国天文历法学的形成期 (51)

四 司马迁和他的《律书》 (58)

1. 《律书》的内容与写作目的 (58)
2. 关于《律书》的真伪 (65)
3. 《汉书》对《律书》的继承 (70)
4. 《律书》对后世的影响 (75)

五 司马迁和他的《历书》 (81)

1. 《历书》——我国第一部历法理论著作 (81)
2. 元封七年的改历与《历术甲子篇》的缺陷 (85)
3. 关于“四分历”的特点 (87)
4. 关于《历术甲子篇》的分段 (90)
5. “太初历”的施行与司马迁的重新被提起 (92)
6. 东汉人对“四分历”的再议 (95)

7. 关于《历术甲子篇》的作者	(96)
8. 《历术甲子篇》的收入《史记》与司马迁的惨死	(98)
六 司马迁与《天官书》	(100)
1. 先秦星经的流传	(100)
2. 甘氏、石氏、巫咸氏三经的真伪	(103)
3. 关于三经中的距度、去极度	(111)
4. 司马迁的星官和后世的星图	(112)
5. 司马迁之后人们对恒星的研究	(115)
6. 司马迁对行星运动的研究	(116)
7. 星官——天上的人间世界	(120)
8. 星官说对后世的影响	(123)
9. 《天官书》中的唯物主义精神	(126)
10. 《天官书》中的进步史观	(128)
11. 关于《天官书》的作者	(130)
附录一 《史记》“三书”全译	(133)
《律书》(133) 《历书》(146) 《天官书》(191)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54)
后记	(256)

— 司马迁——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

1. 司马氏的天文世家

司马迁,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这样提到他:“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称他为“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天文学者看来,他除了当之无愧为此两“家”外,还是一位科学巨星,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历法学家。

汉景帝(刘启)中元四年(前146年),司马迁生于龙门一个叫做司马氏的天文世家里。

司马氏,这是一个以天文事业传世的家族。《国语·楚语》说:“及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

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这里介绍了司马氏的先世,他们是重黎氏之后。重氏、黎氏,一司天,一司地。司马贞《索隐》:“二官亦通职”,故统言之。

对程伯休父以下的司马氏世谱,唐人林宝言之较详。他在其《元和姓纂》中这样说:“司马,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父为司马,克平徐方,锡(赐)以官族。在赵者曰凯,以传剑知名;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司马错。(错)孙靳;(靳)孙昌;(昌)生无怵(《史记》作泽);无怵生喜;喜生谈,太史公;(谈)生迁,汉中书令。”《新纂姓氏笺释》也说:“司马,河内郡,支出程氏。周,程伯休父为周司马,以官为氏。”

司马氏的先祖,“代掌天地”——世代掌管国家天文、地理,是一种世袭的职官。所以说他们是一个天文世家。

司马迁本人在其《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这样介绍他的家世: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

之相王，王印于殷。汉之伐楚，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

自程伯休父之后，司马氏家族一直没有中辍他们的天文事业。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仆之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谈更“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西汉一位天文学家，《天官书》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

司马迁出身于这样一个天文世家，无怪乎他能写出《天官书》、《历书》这样伟大的著作。

2.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

司马迁生于何年？《史记》没有说，《汉书·司马迁传》不曾记载。只有张守节《史记正义》里透出了一点信息。张在《太史公自序》“当太初元年”一语下注释说：“案迁年四十二岁。”

这句话说得不清不楚。是司马迁一共活了四十二年呢？还是说在太初元年司马迁的年龄为四十二岁？

又一个引起争论的因由是司马贞《史记索隐》。他在《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注：“《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三年”则为元封三年，那么司马迁就是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生的了。

这一种说法也并不可靠。因为如果司马迁为公元前135年所生，那么郭解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被杀，司马迁在其被杀前见到他时才足九岁。才足九岁的孩子见到一个游侠，能

产生这样的心态吗?“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游侠列传》“太史公曰”)相反的,如果说司马迁于太初元年为四十二岁,此时年交十九,以上的话,倒符合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的心理活动。

因此,从梁启超、王国维,到当代人程金造、郑鹤声、吉春等都主张,太初元年,司马迁四十二岁。

那么司马迁生于公元前哪一年呢?他们不约而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这几乎是所有主张张守节《正义》说的人都犯的一个错误。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哪一年?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十二月,禋高里,祠后土……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秋八月行幸安定……”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太初元年改历,以正月为岁首。因此,这一年的月份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十二月,一共十五个月。这是一个一望即知的问题,但许多人却不注意它。

这就是为什么太初元年有一个前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又有一个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问题。

因此,该年的月份年数对照,就应如下表:

公元前 105年	公 元 前 104年											
十 月	十 月	十 月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月	十 月	十 月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